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 >>> >>

国家软实力 与文化安全研究

——以广州为例

GUOJIA RUANSHILI
YU WENHUA ANQUAN YANJIU

□涂成林 史啸虎 等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涂成林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9

(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

ISBN 978-7-5117-0018-6

I. 国…

II. 涂…

III. 文化-国家安全-研究-广州市

IV. G1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2344号

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307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

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 丰 衣俊卿 杨 耕

李德顺 张其学 汤应武

李江涛 胡 潇 涂成林

郭德焱 曹建文 蒋 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4
二、文献综述	7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7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11
(三)中西方文化安全研究比较分析	18
三、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20
四、研究的基本方法	23
(一)文献研究法	23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23
(三)比较研究法	24
(四)案例分析法	24
(五)跨学科、多维视角的研究方法	25
第二章 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一般理论分析	26
一、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基本界定	26
(一)国家软实力	26

(二)文化安全	30
(三)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关联	34
二、国家软实力的凸显与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37
(一)全球化信息时代国家软实力的凸显	38
(二)文化与国家核心竞争力	41
(三)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 and 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47
三、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相关理论	51
(一)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51
(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55
(三)萨义德的文化殖民理论	57
 第三章 国外加强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经验启示	62
一、不同文化群体的基本安全形势	62
(一)霸权文化群体	62
(二)强势文化群体	63
(三)弱势文化群体	63
二、霸权文化群体的文化安全策略	64
(一)极端重视文化安全——处于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地位	64
(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积极推行文化扩张战略	65
(三)吸收与“再出口”——巧妙化解外界压力	66
三、强势文化群体的文化安全策略	67
(一)欧盟的文化安全策略	67
(二)加拿大的文化安全策略	71
(三)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安全策略	74
四、弱势文化群体的文化安全策略	77
(一)俄罗斯的文化安全策略	77
(二)印度的文化安全策略	81
(三)新加坡的文化安全战略	83
五、国外加强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经验启示	86
(一)要适当进行文化保护,确保民族文化安全	86
(二)寻求国际合作伙伴,提高抵御霸权文化的能力	88

(三)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消极封堵不是办法	89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全力扶持	90
(五)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	90
(六)选准突破口,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92
(七)要积极发挥公共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作用	92
第四章 文化安全视域中的文化产业发展	94
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文化安全的意义	95
(一)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国民的价值观念	95
(二)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影响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	97
(三)文化产业发展决定了文化创造力的水平	98
(四)文化产业已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实力”	100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102
(一)取得的成效	102
(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06
三、文化安全视域中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以广州市为例	110
(一)优势	110
(二)劣势	113
(三)机遇	115
(四)挑战	118
(五)发展对策	119
第五章 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128
一、国际文化交流的现状、特点与主要形式	128
(一)国际文化交流的现状	128
(二)国际文化交流的特点	129
(三)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130
二、中外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133
(一)中外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历程	133
(二)中外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现状	135

三、文化霸权主义的输出途径及其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137
(一)文化霸权主义的输出途径	137
(二)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安全影响的主要方面	141
四、提高我国对外交往中文化安全的对策——以广州市为例	148
(一)广州对外文化交流的现状	148
(二)广州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49
(三)提高广州文化安全水平的若干对策建议	152
第六章 文化安全视野下的民族传统文化	159
一、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159
(一)从民族精神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161
(二)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163
(三)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165
(四)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166
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	168
(一)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168
(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现状中积极的一面	170
(三)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现状中存在的文化安全威胁	173
三、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177
(一)全球性文化和市场经济文化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177
(二)全球化和改革开放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179
(三)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中的价值彰显	182
四、文化安全视野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对策与措施——以广州市为例	185
(一)广州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185
(二)广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发展的现状	187
(三)文化安全视野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举措	189

第七章 网络时代的文化安全与防范	195
一、网络产生及发展现状	196
(一) 互联网的产生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196
(二) 网络文化的兴起	200
(三) 网络文化的发展状况	202
二、网络对文化安全的影响和挑战	203
(一) 网络文化促使我国文化管理发生深刻变革	203
(二) 网络文化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205
(三) 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挑战	207
三、广州网络文化的发展现状	211
(一) 广州网络文化的特点	211
(二) 广州网络文化的现状	212
(三) 广州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	214
四、广州网络文化安全防范措施与发展的对策	216
(一) 构建网络文化广州安全保障体系,建立网络安全防范机制	216
(二) 加快广州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步伐,建立完善的网络文化安全保障体系	217
(三) 把握网络文化主旋律,加强广州先进文化建设	219
(四) 加强全体市民的网络文化安全意识教育	219
(五) 加快硬件建设,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220
(六) 实行网络文化风险评估,建立安全监控体系,推行安全等级保护	221
(七) 建立网络文化紧急处置预案	221
(八) 以国家相关法律为准绳,建立广州网络文化法规	222
(九) 推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占领网络文化阵地	223
第八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	224
一、国际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现状、特点与趋势	224
(一) 技术、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基本概念	224
(二) 国际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225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发展趋势	228
二、中外技术交流的现状、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233
(一) 中外技术交流发展历程及特点	233
(二) 中外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235
(三) 中外技术交流存在的问题	239
三、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发展对策——以广州市为例	242
(一) 广州对外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发展现状	242
(二) 广州对外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特点	243
(三) 发展对策与建议	246
第九章 全球化语境中的宗教文化与文化安全问题	257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文化的现状	257
(一) 关于宗教的涵义	257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文化的发展概况	260
(三) 中国宗教发展的主要特征	264
二、宗教文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266
(一) 宗教与文化	266
(二) 宗教文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267
三、宗教文化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274
(一) 宗教的反向功能	274
(二) 宗教文化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277
四、宗教文化语境中加强文化安全的基本措施	
——以广州市为例	284
(一) 广州宗教发展概况	284
(二) 广州宗教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86
(三) 加强广州宗教文化安全的措施	291
第十章 结语	295
参考书目	300
后记	308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国家安全的取得和维护是通过国家实力来实现和保障的。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战略理论中,评估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指标就是经济和军事。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孙子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以军事力量为首要国力的思想。西方学者在20世纪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军事实力为中心的国力论。虽然在20世纪中后期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综合国力中非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如,1964年约瑟夫·弗兰克尔在他的《国家关系论》中强调了社会心理对综合国力的影响;1980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R. S. 克莱因在他的《世界权力的评估》和《80年代世界权力趋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等书中提出了“国力方程”,在这个方程中,R. S. 克莱因引人注目地把“精神要素”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赋予和物质因素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过,西方关于国力的研究仍然没有脱离强权政治的色彩,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内容。^①

^① 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00页。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冷战的结束，这种传统的国力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被彻底改变。许多学者对冷战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军事上长期处于战略守势的美国，却最终战胜了军事上咄咄逼人的苏联，这并非美国的硬实力过于强大，而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软件、电视、麦当劳等文化产品夹带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冲毁了苏联东欧的防线，最终主导了对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苏联东欧冷战的胜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的胜利。冷战的胜利让人们第一次真切看到了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冷战结束以后，阻碍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樊篱成功拆除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规模空前扩大，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西方学者也开始把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力形态纳入到关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总体研究之中。

现在学界都比较一致的认为，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软实力（也翻译成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Soft Power）概念并加以系统论述的人。尽管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软实力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都没有约瑟夫·奈论述得那样清晰。曾经先后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从1990年开始从事软实力理论研究。1990年，他分别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夏季号）和《外交政策》（秋季号）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实力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明确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2002年，他出版专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进一步发展了其“软实力”理论。2004年，他在其新著《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集中总结和概括了他的软实力理论。他认为，“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整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索要结果的能力。他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者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要的行为。软实力存在使别人被某种观念吸引或者能够决定别人喜好的能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如果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威胁（或者大棒），通过利诱（或者胡萝卜），或者通过吸引和互相

选择,前两者属于硬实力,后者就是软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表现在一个国家通过依赖经济“胡萝卜”诱惑或军事“大棒”威胁别国去干它们不想干的事情,也包括一种间接使用实力的方法,即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价值观、政策亲和力和以自己价值观、制度和偏好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来设置别国的议程。这种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

软实力理论把文化因素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它看作是一种影响国家兴衰和世界进程的重要力量,从此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一样,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力量。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也大大改变了国家安全形态的内在结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随着软实力的提出而进入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文化实力作为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相对应的一种“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其政治扩张目的的重要手段,主要表现是拥有相对文化优势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国际战略中不断加强运用文化实力制约、影响国际事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其中在对外文化扩张方面尤以美国最为积极。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2年9月公布的《美国的复兴日程》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球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①在此以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制订美国的安全战略时,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而西方国家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兴行,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安全压力与挑战。所谓文化安全是指国家防止异质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生活渗透和侵蚀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渗透”、“文化控制”而言,是一种相应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②

不过,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的兴行只是文化安全问题受到

① 新华社华盛顿1992年9月10日英文电。

② 张守富、朱彦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大安全》,《党政干部论坛》,2000年第12期。

重视的直接诱因，而真正将文化安全提到和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同等地位的更深层因素，还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为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提供了发展环境和舞台。

发轫于15世纪的“全球化”，其标志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萌生。不过有人考证，“全球化”正式出现在西方人的著述中，还是在1944年。1961年“全球化”一词被正式收入权威版本的《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之中，从此“全球化”概念开始在西方世界普及开来。至20世纪末，全球化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流行话语，其深刻的影响也早已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最典型的发展特征。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极大地拉近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世界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频度上相互交汇、碰撞，这使每一个国家都难以成为文化孤岛，难以隔绝与外部的信息交流。这种频繁的国际交往，使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化，文化安全问题随之凸现出来。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促使了文化的大众化、冲击了文化的封闭性，促使不同区域文化的相互交融与碰撞增强；另一方面，全球化加深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同时也使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产生了担心本国文化将被外来文化侵袭或吞噬的不安全感。而且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成正相关，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趋凸现。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也存在文化安全问题，只不过发展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更为严重罢了。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不仅是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而且是国家文化安全衍进的一个重要变量。文化安全问题也因此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理论关注的焦点。

（二）研究意义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而在以“文化论输赢”的时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更是日趋激烈，这意味着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从“硬实力”的竞争转向“软实力”的竞争，从而凸显出文化安全的重要地位。同时，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经济侵略与科技封锁等表面化的、对抗性的竞争方式相比，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除了受到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是不设防的，或者无法有效地设防，这就使得对国家文化安全

的研究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因此，确立“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当今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趋势有更深入、更明确的洞察，而且使我们在未来的文化竞争中未雨绸缪，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第一，研究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问题，有助于填补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关系研究的理论空白，促进和深化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国家的生存包括领土完整、政治制度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利用他们强大的软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侵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在不仅面临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也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安全已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涉及一个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命运，已成为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现实问题。因此，文化安全问题近些年来很自然地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不过，从目前可获得的资料文献中，我们发现国内外大量关于文化安全的论著虽然都涉及到了软实力的内容，但研究重点都是一些如何提高文化安全的对策性研究，而很少对更为基础的关于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相互关系、互动机理等问题进一步的探究，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尤其做得不够。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倾向是有失偏颇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试图在重新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入手进行文化安全研究，并希望这一研究对于了解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对于推动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学科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将文化安全与国家软实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拓宽了思维的方法和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有助于确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安全观念。

我国学界对文化安全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研究热潮是从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论战开始的。亨廷顿预测西方文明今后将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发生严重冲突，这大大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神经，纷纷对美国文化霸权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也开始以中国为研

究对象提出了很多提高文化安全的对策，掀起了一股文化安全研究热。但当前很多学者研究文化安全时还是沿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标准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判断，多是从如何应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侵蚀的角度进行文化安全研究。文化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入侵与反入侵、控制与反控制似乎成了文化安全的永恒主题。这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动消极的防御型文化安全观其实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因此，必须先从文化安全学科基础研究入手，从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内在关系研究入手，拓宽思维的方法和角度，拓展思维的空间，形成一种积极主动的新型文化安全观。

第三，以广州为例对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和文化安全水平的有效提高找到一些战略性的、可操作性的对策。

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简单地说，处在安全状态的文化能够产生强大的软实力，而国家所具有的综合软实力又会促进文化安全。软实力越强的国家，其文化安全水平往往也是越高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比较弱，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了严重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威胁、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西方文化产业的挑战，文化安全总体态势不容乐观。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随着我国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威胁论也尘嚣四起。如何打消外界疑虑和猜忌，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如何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和侵蚀，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广州地处祖国的南大门，是对外文化交流、文化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我们以广州为例进行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研究，对探寻有效提高我国文化安全水平和实现和平崛起的对策与途径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要在世界上顺利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取决于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有形硬实力，而且还需要作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不断提高。同时，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不应该单纯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进行消极防御，而要有世界眼光、全球意识，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水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问题最早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至今对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分析得比较透彻的仍然是欧美的思想家，尤其是美国学者。不过由于我们掌握的外国研究文献资料有限，难以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一列举，因此只选择了他们在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方面取得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从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与反霸权文化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 为西方文化霸权提供理论依据的学者及主要观点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为了配合这种攻势，美国的一些学者纷纷抛出了“软实力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观点。这些观点都为西方国家全面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加强文化渗透与扩张披上了一层正义、合法的外衣。可以说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理论基石。

（1）软实力论

1990年，为了回击80年代美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兴起的“美国衰落论”，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分别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夏季号）和《外交政策》（秋季号）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实力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以此来分析国际政治中权力性质所发生的变化。他认为，“硬实力”（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和“软实力”（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在奈看来，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主权斗争的新领域，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

软实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到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并成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他还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①

（2）历史终结论与普世价值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于1989年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并于1993年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专著。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和西方自由主义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因此，历史已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消费文化必将造成一个全球同质的西方化的社会。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1995年，他又出版了《信任：社会美德及繁荣的产生》一书，进一步提出制度在历史终结时呈现趋同的趋势。“历史终结论”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并企图把它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人类社会。

（3）文明冲突论

与福山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相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坚信文明的差异性存在及各种文明之间竞争与争夺的不可避免性。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论文以及1996年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文明冲突将成为后冷战主要冲突方式。在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这种“文明冲突”将决定“未来的国际政治”。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组成新的联盟，而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将走向分离

^① 张骥、刘中民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